

# 文革漫談

• 王年一

## 小 序

蕭乾老先生1986年8月在《北京晚報》上發表過幾篇〈「文革」雜憶〉，我現在來寫〈文革漫談〉。蕭老寫的是親身經歷，我寫的則海闊天空，舉凡「文革」的人、言、行、事，無所不談。大多不是親身經歷。坦白地說，我沒有寫作計劃。興之所至，思之所至，隨手寫下。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故曰「漫談」。

可敬的老人巴金在晚年寫了一套《隨想錄》，它以說真話而著稱於世。「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我如草芥，但敢自詡：拙談中沒有一句假話。

## 一 「文革」前毛澤東眼中的中國現實

毛澤東認為蘇聯和許多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而中國共產黨高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旗幟。既然如此，加上中國共產黨又是一個大黨、中國又是一個大國，他就合乎邏輯地認為中國逐步地成為「世界的革命中心」。

伴隨着中國是「世界的革命中心」這種認識，產生了兩方面的想法：一是要把中國建設成「純潔」而「完美」的社會主義社會，成為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保持鮮艷紅色的樣板；二是認為中國的現實太不「純潔」、太不「完美」了，存在許多「黑暗面」。國際「反修」的深入，強化了中國是「世界革命中心」這種認識。這種認識的強化，又深化了上述兩種想法。這兩種想法的共同之處是：中國要來個大變化，大破大立。要把中國建設成樣板的心情愈急切，就愈是認為中國的現實太不理想。「左」傾錯誤特別是沒有弄清楚甚麼是修正主義，使中國的現實在毛澤東的眼中失真。

文革前，毛澤東認為蘇聯和許多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他就合乎邏輯地認為中國逐步地成為「世界的革命中心」。因此他產生了兩方面的想法：一是要把中國建設成「純潔」而「完美」的社會主義社會，成為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保持鮮艷紅色的樣板；二是認為中國的現實太不「純潔」。存在許多「黑暗面」，因此要來個大破大立。

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對中國現實的估計，比較集中地反映在《五一六通知》、毛澤東致江青信（1966年7月8日）、〈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1966年8月5日）、黨的九大政治報告（1969年4月1日）、〈毛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等文獻和毛澤東的一些講話中。

毛澤東眼中的中國現實是怎樣的呢？

### （一）知識份子存在着「修正主義階層」

毛澤東在1963年12月12日和1966年6月27日兩次作了關於文藝工作的批示，認為文藝界「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文藝界「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1965年8月3日，毛澤東與法國馬爾羅（André Malraux）談話。馬爾羅問：現在中國修正主義階層是否廣泛存在？毛澤東答：相當廣泛，人數不多，但有影響。這些是舊地主、舊富農、舊資本家、知識份子、新聞記者、作家、藝術家以及他們的一部分子女。馬爾羅又問：為甚麼有作家？毛澤東答：有一部分作家的思想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我們把舊的攤子都接收下來了。我們原來沒有藝術家、記者、作家、教授、教員，這些人都是國民黨留下來的。

在1966年3月17日至2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愈深入，他們就愈抵抗，就愈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

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對胡志明說：

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出版界、文藝界、大學、中學、小學。因為當時我們沒有人，把國民黨的教員都接收下來了。大、中、小學教員，辦報的，唱戲的，寫小說的，畫畫的，搞電影的，我們很少，把國民黨的都包下來。這些人都鑽到我們黨內來了。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卡博（Hysni Kapo）、巴盧庫（Beqir Balluku）說：

大學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懷疑的，特別是讀文科、社會科學的。這些人如果不進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這些人將來就是修正主義。搞文學的不能寫小說，不能寫詩；學哲學的不能寫哲學文章，也不能解釋社會現象。還有學政治的、學法律的，都是一些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沒有搞出甚麼好的教科書。還有學經濟的。修正主義份子可多了。

1966年12月18日，他對斯諾（Edgar Snow）說：「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啊，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裏統治。」

在毛澤東修改過三次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及他主持起草並修改定稿的《五一六通知》中，也有着極端的估計。

中國的現實在毛澤東的眼中失真。毛澤東認為文藝界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文藝界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1966年12月18日，他對斯諾說：「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啊，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裏統治。」在他主持起草並修改定稿的《五一六通知》中，也有着極端的估計。

1969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說：「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裏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裏。」毛澤東認為一部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老幹部形成了黨內的派別，這完全不符合事實。張聞天說：「把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許許多多不同的意見，都看成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就必然要亂戴帽子，任意開展鬥爭了。」

毛澤東1939年12月1日為中共中央寫的〈大量吸收知識份子〉的決定正確地指出：「沒有知識份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sup>①</sup>按照1950年8月4日政務院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在新中國成立後，知識份子的大多數就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黨中央於1956年1月召開的知識份子會議上，在中央政治局隨後通過的《中央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指示》中，黨中央重申知識份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sup>②</sup>。1956年國際國內出現了一些重大事件，對這些事件的正確和不正確的認識都給了毛澤東以相當影響，此後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變化。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說：黨內大約有一百萬知識份子，這一百萬知識份子，「他們主要代表……城市和農村中生產資料比較多的那一部分人，如富裕中農。」<sup>③</sup>1957年以後，隨着「左」傾錯誤的逐步發展，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認識愈來愈違反實際。胡喬木在〈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干問題〉<sup>④</sup>中說：「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對當代的作家、藝術家以及一般知識份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應有的信任，以至錯誤地把他們看成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甚至『黑線人物』或『牛鬼蛇神』。」

## (二) 黨內形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1965年1月14日）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對情況作了更加違反實際的估計。他說：有「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又說：「中央和中央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樣的「代表人物」，就是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9年4月28日，毛澤東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回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形說：「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裏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裏。」

何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1967年5月與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談話時作過解釋。他說：在這裏我問大家另外一個問題，你們說甚麼叫作走資派？（眾不語）所謂走資派就是這些當權派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吧！就是說，這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期，對反對三座大山是積極參加的，但到全國解放後反對資產階級了，他們就不那麼贊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時，他們是積極贊成並參加的，但到全國解放後，農村要實行集體化，對此就不那麼贊成了。他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他現在又當權，那可不就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嗎？就算是老幹部遇到新問題吧！毛澤東認為一部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老幹部形成了黨內的派別，這完全不符合事實。黨內根本不存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張聞天說：「把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許許多多不同的意見，都看成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就必然要亂戴帽子，任意開展鬥爭了。」<sup>⑤</sup>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走資派」定為敵我矛盾性質。《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作了這樣的規定。毛澤東說：「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的

主要對象是混入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8年12月26日以後，情形才有了變化㉑。

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嗎？

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如果中央出了赫魯曉夫，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10月12日，毛澤東又在這個會議上說，中國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就要造反，不造反，犯錯誤。

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寫道：「中央和中央各機關，……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致江青的信中寫道：「有些反黨份子……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

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搞了一線、二線㉒，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卡博、巴盧庫時說：

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鬥爭沒有公開化。比如，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1962年，63、64、65、66，五年的時間。為甚麼說我們有不少工作沒有做好？不是跟你們講客氣的，是跟你們講真話。就是過去我們只抓了一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又說：才別相信我們這個黨裏都是好人。好幾年以前我就說要洗刷幾百萬，那不是講空話嗎？你有甚麼辦法？毫無辦法。……過去我公開聲明，我說，《人民日報》我不看。當着《人民日報》總編輯也說，我不看你的報紙。講了好幾次，他就是不聽。我的這一套在中國是不靈的，所有大中學校都不能進去。因為控制在劉少奇、鄧小平、陸定一的中宣部、周揚的文化部這些人手裏，還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這些人手裏，毫無辦法。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斯諾，對斯諾說到他對文化大革命前夕黨內上層狀況的估計：「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

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回顧既往時說：我感覺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

由於「左」傾錯誤的發展，毛澤東認為中央第一線出了「修正主義」。

### (三) 北京可能發生「政變」

1964年10月16日，赫魯曉夫 (Nikita Khrushchev) 下台，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接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職務。11月，以周恩來為團長、賀龍為副團長

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1966年7月8日，毛在致江青的信中寫道：「有些反黨份子……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1966年10月25日，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我感覺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由於「左」傾錯誤的發展，毛認為中央第一線出了「修正主義」。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1981年許世友在一個會議上說：「『文革』前夕，毛主席在杭州說，黨中央有個反革命集團要刺殺我怎麼辦？」這種估計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毛澤東作出了這種嚴重得無以復加的災難性的估計，他就以個人否定集體領導，發動文化大革命。

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蘇，參加莫斯科紀念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慶祝活動。據伍修權在其回憶錄<sup>①</sup>中說，蘇方有人惡意煽動。11月7日晚上，在蘇聯政府舉行的招待會上，蘇聯國防部長、元帥馬林諾夫斯基 (Rodion Malinovsky) 竟對賀龍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仿效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搞下台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據《王光美訪談錄》，早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蘇聯大使尤金還在北京對留守中央的陳毅同志說：『現在你可以搞政變了。』」蘇聯想搞垮中央之心，早已有之。)賀龍立即很嚴肅地對他說：「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兩件事，我們黨和你們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你們想法是根本不會實現的，而且是錯誤的。」朱可夫 (Georgy Zhukov) 元帥也對馬林諾夫斯基表示：「我們並不這樣看。」賀龍馬上向周恩來反映這一情況，周恩來當即向勃列日涅夫、蘇斯諾夫 (Mikhail Suslov) 和米高揚 (Anastas Mikoyan) 等人指出，馬林諾夫斯基的講話是對我們的嚴重挑釁。在隨後舉行的正式會談時，周恩來又就此事向蘇方提出嚴重抗議。直到勃列日涅夫表示了道歉，我代表團才未再加追究。搞掉赫魯曉夫得力於軍方的支持。馬林諾夫斯基如此猖狂挑釁，對毛澤東有何影響，不得而知；但可以確知，毛澤東此後想到了政變問題。

1965年底和1966年3、4月間，毛澤東問過軍隊和地方幾位領導同志：如果北京發生政變，你怎麼辦？蕭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去年上海會議後，主席又問許世友同志，假如北京發生了政變，你怎麼辦？主席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是文化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這是最危險的。」

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寫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佔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卡博、巴盧庫時說：當着公開發表北京市委改組的時候(按為1966年6月)，我們增加了兩個衛戍師。……所以你們才能到處走，我們也才能到處走。

1981年6月19日，許世友在一個會議上說：「『文革』前夕，毛主席在杭州說，黨中央有個反革命集團要刺殺我怎麼辦？我說出兵北上。」

這種估計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毛澤東與中央一線之間，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對中國現實的認識，異大於同，矛盾盤根錯節，毛澤東又作出了這種嚴重得無以復加的災難性的估計，他就以個人否定集體領導，發動文化大革命。

## 二 個人反對中央集體

從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發表，到1966年4月，算作「文革」的準備階段，或曰初步發動階段。

這一階段的最大特點是毛澤東個人反對中央集體。不是聳人聽聞，請看事實：

姚文是毛澤東批准發表。發表以前，據毛澤東1967年2月3日對卡博、巴盧庫說，江青說：「這篇文章只給你（指毛澤東）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不能看，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這篇文章的。」毛同意。這說明，毛是背着中央集體批准姚文的發表，毛又是明知中央集體不會同意姚文的觀點而批准發表的。發表以後，又隱瞞是毛批准的這一事實。全國各地都未轉載姚文，卻歸咎於彭真和北京市委。更重要的是姚文本身是借題發揮。它固然是打擊、誣陷吳晗的，更是在所謂「單幹風」、「翻案風」問題上算中央集體的老賬。「單幹風」和「翻案風」，本是毛1962年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對中央集體的無理譴責，中央集體默默忍受了。事情已成過去。此時重算舊賬，對中央集體加以鞭撻。姚文的要害，正是無理指責中央集體。

批判《海瑞罷官》這一炮沒有打響。和者甚寡，反對姚文的很多。江青又開闢一個戰場——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用江青自己的話來說，請解放軍「尊神」以「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真正作者是江青、陳伯達、張春橋、毛澤東。陳、張始終參加修改，毛修改三次並定稿。這個文件，提出了「文藝黑線專政」論。這既是對文藝界的指責，更是對中央集體的非難。邏輯只能是這樣：既然十六年來「文藝黑線」專了政，中央集體就不能辭其咎。

準備階段裏最大的事件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彭真有甚麼問題呢？沒有。批彭，說到底，就因為他有限度地保護過吳晗。羅瑞卿據稱有兩大問題：一是反對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這是真的，正確的是羅瑞卿；二是「篡軍」，要奪林彪的權，這是假的，軍隊大權任何人絕不可能篡奪。陸定一只有一件事：他的夫人嚴慰冰寫過匿名信。寫匿名信不足為訓，但是反對的是葉群。所寫都是生活問題，不是「反革命匿名信」。嚴慰冰寫信，陸定一並不知道——從信的內容來看，是特別不宜讓丈夫知道的。楊尚昆據稱私放過竊聽器。所謂「竊聽器」，原來是錄音機。錄音機又不是楊尚昆而是汪東興要人放的（撤了楊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之職，接替楊的正是汪東興）。批判這四人，可以給以八字評語：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錯誤批判，既是對着四位老革命家的，又不止是對着四個人的，而是帶有「掃清外圍」的性質。後來發生的事件雄辯地說明了這一點。

毛澤東1966年3月底與康生等人談話時，明確號召「向中央進攻」。「向中央進攻」這五個字，赫然印在《五一六通知》的附件上，發至全黨。

準備階段還有其他一些特點，如：反常、撲朔迷離、迂迴曲折、借用軍隊力量、武斷和專橫。這些特點都是由個人反對中央集體這個總特點派生出來的。

從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發表，到1966年4月，算作「文革」的準備階段。批判《海瑞罷官》這一炮沒有打響。和者甚寡，反對姚文的很多。準備階段裏最大的事件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彭真有甚麼問題呢？沒有。批彭，說到底，就因為他有限度地保護過吳晗。批判這四人，可以給以八字評語：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毛澤東何以反對中央集體呢？他認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懷疑中央集體，毛自己說過，自1962年七千人大會始。下文要說到，毛通過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

### 三 中共中央的一次全會

這次全會就是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雖然只開了十二天，但是發展變化很大。會議開得十分倉促。1966年7月24日才發出開會通知，8月1日就開會了。劉少奇在開幕會上報告了十中全會以來的中央工作，十分簡略，而且沒有印發文字稿。會前，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等之間在對工作組的評價實際上存在意見分歧。

1966年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對文革發展影響很大。毛澤東在劉少奇8月1日講話時又一次插話抨擊工作組和派工作組，但是附和者寥寥。8月4日，毛在講話中說共產黨鎮壓學生運動，還不點名批判了劉少奇。當劉說到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毛於8月7日在全會上發表了〈炮打司令部〉。除江青等極少數人外，無一人表示擁護這張大字報。於是毛決心改組中央領導機構。

會議本來打算開五天。雖然毛澤東在會前多次譴責工作組和派工作組，雖然毛澤東在劉少奇8月1日講話時又一次插話抨擊工作組和派工作組，但是附和者寥寥。8月4日，全會發生異常情況。原定下午召開大會，與會者到會場後才得到改開小組會的通知。下午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講了份量很重的話，主要內容是：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到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說得輕一點，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准來往，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毛在講話中還不點名批判了劉少奇，點名批判了李雪峰。當劉少奇說到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當葉劍英說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牛鬼蛇神時，毛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毛澤東提出，各組傳達、討論他的講話。全會議程為之改變。

各組討論時，沒有隨聲附和者，沒有對毛4日講話的熱烈擁護者。這是個重要情況。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黨內核心領導發生矛盾，大家不好隨便插嘴。「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等語，大家也不能接受。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都是派了工作組的。

既然如此，毛於8月7日在全會上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責更嚴厲了，上綱更高了。印發這張大字報的前夕，毛要秘書徐業夫通知在大連養病的林彪到會。林乘專機返京。為甚麼要林與會，這是不難明白的，借重軍隊了。大字報發表以後，林彪與會以後，會上空氣更加緊張。

緊張歸緊張，因為大字報點到「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打擊面更大了），大字報上綱又很高（「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所以除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外，依然沒有附和者。除江青、康生、張春橋等極少數人外，無一人表示擁護這張大字報。

往日，毛澤東一呼，下面百諾。這一次，情形迥異。於是毛澤東決心改組中央領導機構。他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候選人十一人名單。

8月12日下午，林彪主持大會。大會內容之一是選舉。儘管人們思想不通，對上述十一人大多還是投了贊成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十一人全部當選。其中得全票的有四人：毛澤東、林彪、鄧小平、康生；只少一票的有周恩來、陶鑄、陳伯達三人(有可能是他們沒有投自己的票)；其他三人得票超過半數。

這次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實質，是否定和取消了中央第一線(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在八大後分為第一線、第二線，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在第一線，主持中央工作，毛澤東退居第二線。事實上毛始終未完全退居第二線)。毛澤東重返第一線，把大權集中在個人手中，這是後來「文化大革命」不可收拾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

#### 四 把個人置於中央集體之上

在中央領導機構改組以後，毛澤東是否尊重、依靠、服從中央集體呢？這讓事實來回答。

毛澤東以個人的崇高威望發起了紅衛兵運動，這是沒有取得中央集體的同意的。毛澤東1966年8月1日致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信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了，但是全會並無任何肯定紅衛兵的表示。《十六條》沒有提到紅衛兵，而只提到「革命青少年」。在毛澤東提出召開的號召造反的「八·一八」大會上，毛澤東讓紅衛兵上了天安門城樓，讓紅衛兵宋彬彬給他戴上了紅衛兵袖章，又檢閱了紅衛兵。毛澤東當然知道這些意味着甚麼。果然，在這次大會以後，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遍及全國城鎮。沒有紅衛兵運動，就沒有後來那樣的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親自倡導了大串連，這也是未經中央集體討論決定的。毛澤東八次接見來自全國的紅衛兵和師生，被接見者達一千一百萬人之多，這本身就是對大串連的提倡、支持和鼓勵。中共中央、國務院是在1966年9月5日發出過一個組織外地師生來京的通知，那也是毛澤東個人決定的。這種數以千萬計的全國大串連，這種乘車、坐船、吃飯、住宿都不要錢的全國大串連，為古今中外的奇觀。數以億計的金錢花掉了，造成全國性的動亂。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毛澤東專斷提出的。高文謙在《艱難而光輝的最後歲月》(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1期，《人民日報》1986年1月5日轉載)中說：「1966年10月，毛澤東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周恩來不同意這一提法。為此，他專門找了毛澤東，……毛澤東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紅旗》雜誌1966年第13期社論首次公開提出「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社論發表前，陶鑄、王任重提出異議，均遭拒絕。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際上就是批判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和鄧小平。且不說「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不存在，這與組織手續也不合。在全國批判的結果，是天下大亂。

毛澤東個人決定在工廠、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形式上是中央集體決定的，實際上是個人決定的(名曰集體決定實為個人決定的情形過去屢見不鮮)。毛澤東否定了陶鑄、余秋里、谷牧為阻止在工交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而主持制

在中央領導機構改組以後，毛澤東是否尊重、依靠、服從中央集體呢？毛以個人的崇高威望發起了紅衛兵運動，這是沒有取得中央集體的同意的；他親自倡導了大串連，這也是未經中央集體討論決定的；毛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周恩來不同意這一提法。毛個人決定在工廠、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形式上是中央集體決定的，實際上是毛個人決定的。



訂的《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其中規定進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不得不通過要求在全國工交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1966年12月6日下午通過的)。過去一系列經毛澤東批准的不在工交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中共中央文件(包括《十六條》)，被推翻了。至於要求在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是林彪主持的，1966年12月1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林彪在會上唸了毛澤東對這個文件的批示：請林彪主持會議，開會通過，現即發出。這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動亂就迅速蔓延到全國工礦和農村。

毛澤東批准了打倒陶鑄。陶鑄身任六要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他在一系列問題上，堅持原則，反對「左」傾錯誤。水火不容。1967年1月4日，陳伯達、江青在公眾場合污蔑、攻擊他。奇怪的是，頃刻之間，他就被打倒了，再也不露面了。1月8日，毛澤東在內部講了一番話，實際上批准了打倒陶鑄。這都是無法無天。只有中央全會才能夠撤陶鑄的職。而毛澤東於2月10日在內部嚴厲地批評陳伯達和江青，對陳伯達說：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這種批評，令人啼笑皆非。(毛澤東不也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麼？既然打倒錯了，為甚麼不推翻這個打倒而讓陶鑄照舊工作呢？」)

毛澤東批准了打倒陶鑄。陶在一系列問題上，堅持原則，反對「左」傾錯誤。1967年1月4日，陳伯達、江青在公眾場合污蔑、攻擊他。1月8日，毛在內部講了一番話，實際上批准了打倒陶鑄。這都是無法無天。只有中央全會才能夠撤陶的職。毛於2月10日在內部嚴厲地批評陳伯達和江青，對陳說：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這種批評，令人啼笑皆非。

毛澤東號召全國奪權。1967年1月8日，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部分成員談話，高度評價《文匯報》社的奪權，說：「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這些話，當場寫進《人民日報》編者按，毛當場審定，次日發表。)1月15日，陳伯達、周恩來在幾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上先後講話，要大家警惕上海颳起的「接管風」。當日毛澤東聞訊，召開會議，講話批評周、陳。王力等據以寫成《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經毛澤東審定。1月16日，《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同時發表。此文在文革中第一次明白無誤地號召全國全面奪權。

這裏說了幾件關係全局的大事。毛為甚麼又凌駕於新的中央集體之上呢？下文要談到。

## 五 毛澤東的個人專斷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述及文革前十年的毛澤東時說：「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在文革這一部分又說：「毛澤東同志的左傾錯誤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從組織上說，偉大的毛澤東晚年犯錯誤，就犯在個人專斷上。

毛不知道個人專斷不好嗎？不是。他在《關於健全黨委制》(1948年9月20日)中說過：「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說過：個人專斷要「霸王別姬」。毛澤東1975年5月3日同在京中央

政治局委員談話，說到自己：「這一回跑了十個月，沒有講過甚麼話，沒有發表甚麼意見，因為中央沒有委託我。」

既然如此，為甚麼要個人專斷呢？

毛澤東個人專斷的實質，是維護他自己的、不為集體所同意的主張。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毛並不專斷，而是模範地堅持了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的原則。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毛澤東「有最後決定之權」的決定，毛澤東從未濫用這個權力。即使在50年代末期以後，他在一些問題上也不專斷。專斷常常表現在1958年以後他和中央集體在重大問題上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也只有這時才需要專斷。他當然知道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的重要，但是他認為他出於公心堅持他自以為正確的意見更重要，錯就錯在這裏。在堅持組織原則和堅持他的意見二者不可得兼的時候，他放棄了組織原則，認為組織原則要服從政治原則。一個典型例子：毛澤東未經中央集體同意，1959年7月23日在廬山會議上講話，發動批判彭德懷。他知道中央常委不會同意，所以先斬後奏。他認為「右傾思想」氾濫，必須抓個典型，殺雞儆猴。這個典型，就是彭德懷。

毛澤東長期的正確使他過於自信。他在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中引用了劉邦的話：「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又貌似謙遜實為自負地說：「……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長期的領袖地位和長期受擁戴的狀況使他感到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指導黨。1947年至1957年的十年大勝利時說過「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的毛澤東，不自覺地不由自主地驕傲起來。他又有可能機械地搬用了他在歷史上獨排眾議而取得偉大成功的經驗。

毛澤東並不認為個人專斷好得很，個人專斷在他是不得已而為之，所以他想方設法讓中央集體在事後同意他的意見，使他的意見成為中央集體的意見。可見他不是從根本上不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的原則。毛澤東的個人專斷是很特別的，就是在程序上或手續上一般經過集體。由於各種複雜的原因（如對毛澤東的依賴，在毛澤東造成既成事實的情況下不得不顧全大局，對某個問題沒有成熟的見解，黨內生活不正常），中央集體常常無條件地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或在事後同意毛的意見，使得毛的個人專斷不那麼突出。號召成立人民公社、批判1956年的反冒進、批判彭德懷、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把階級鬥爭作為會議的主題等等，本來都是出自個人專斷，卻都成了中央集體的意見。這不僅使少數人更難於反對不正確的意見，而且使毛澤東更有理由堅持自己的意見。鄧小平說過：「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當然，在那個條件下，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sup>⑩</sup>這種看起來是集體決定，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為個人決定的奇特現象，是獨特的歷史條件造成的。毛澤東以前長期代表正確因而具有極高威望，沒有任何人能匹敵，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在眾人的眼中，他是「革命之父」。領導制度不健全，也是一個重要條件。

總之，毛澤東的個人專斷，情形相當複雜，把它簡單地歸咎於封建主義的影響，是想當然的看法，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

這裏須要說到上文提出的問題了。何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中央領導機構之後毛澤東又個人專斷了呢？原因很簡單，毛澤東估計中央集體不會同意他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主張。像在全國開展大串連、全國全面奪權這類問題，中

毛澤東個人專斷的實質，是維護他自己的、不為集體所同意的主張。1959年7月23日毛在廬山會議上講話，發動批判彭德懷。他知道中央常委不會同意，所以先斬後奏。而中央集體常常無條件地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或在事後同意毛的意見，使得毛的個人專斷不那麼突出。把毛的個人專斷簡單地歸咎於封建主義的影響，是想當然的看法，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

央常委會、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實不同意。毛澤東還是想辦法要中央集體同意的，中共「九大」就全都同意了。

全黨造就了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也就是全黨造就了一個不受約束的領袖。僅僅在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的個人專斷，全黨也有責任。毛澤東從未諱言「文革」是他個人發動和領導的，又有幾個人提過異議呢？

## 六 中央文革小組的一項建議

看檔案材料時，我看到一份沒頭沒腦的材料：鉛印，標題是〈當前的幾個問題（1966年8月12日）〉，正文開列了十個問題，落款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辦公室印」，共兩頁。十個問題都寫得很簡略，如第一個問題全文是：「（一）強調學《十六條》，用《十六條》統一認識，統一行動。（寫社論）」第十個問題全文是：「（十）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編印的《簡報》，各省要求發一份。」

我很注意六、七兩條。先把這兩條抄錄如下：

（六）勸告各省市不要動員大批人員到京。已來者要由各省市勸告回去鬧革命。已經有外地來的七千人住在清華大學，吃飯、睡覺都成問題。

（七）各校都以集中精力搞好本單位的革命為主要任務。一般不要到處亂跑，也不要抓別單位的人來鬥爭。支援別人最有效的辦法，是以自己的先進經驗幫助別人，也向別人學習。

我推測這份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組供自己用的，十個問題是中央文革小組所議定。我之所以注意六、七兩條，因為它與四天後陳伯達的公開講話迥然不同。1966年8月16日，陳伯達公開講話，鼓動外地學生來京。這篇題為〈在大風大浪裏成長——8月16日在外地來京學生群眾會上的講話〉，發表於《紅旗》雜誌1966年第11期。陳伯達說：「你們這次到北京來，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首都來，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來，經過很多辛苦，不怕大風大雨，你們的行動很對!!!」

為了弄清楚問題，我寫信向當時兼管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的王力先生請教。我附上複印件，問他兩個問題：一、這是不是中央文革小組集體所議？二、何以四日後陳伯達講話的調子與此截然不同。

王力即覆。承他於猴年大年初一（1992年2月4日）覆我。內容如下：

來信收到，簡覆如下：這一文件是中央文革小組擬定的。這時，八屆十一中全會剛閉幕。會議期間，文革小組的碰頭會仍繼續進行。碰頭會，周恩來和陶鑄每次都參加的。這個文件，是最近幾次碰頭會上議的主要問題的概括，主要是向毛主席的匯報。當時大家都不贊成大批人員來京和串連，因為無法接待，而且會造成鐵路和其他交通的壓力。但是匯報後毛主席不同意中央文革小組的這條意見。他認為蘇聯變修的原因之一就是直接見過

1966年8月16日，陳伯達公開講話，鼓動外地學生來京。其背景據當時兼管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的王力說：「毛認為蘇聯變修的原因之一就是直接見過列寧的人太少了，中國的下一代，應當有大量的人直接見到老一代的革命領袖，愈多愈好。原來，8月10日毛主席就到接待站直接接見群眾，看到了極其熱烈的場面，他自己有深刻的感性認識，並動了感情。而這次接見，事先文革小組和其他中央主要領導人都不知道。」

列寧的人太少了，中國的下一代，應當有大量的人直接見到老一代的革命領袖，愈多愈好。所以才有8月16日陳伯達的講話和以後的做法。原來，8月10日毛主席就到接待站直接接見群眾，看到了極其熱烈的場面，他自己有深刻的感性認識，並動了感情。而這次接見，事先文革小組和其他中央主要領導人都不知道。

王力在未曾發表、允我使用的〈一年零兩個月的回憶——1966年6月至1967年8月〉中說：「大串連的根子在接見紅衛兵。八·一八大接見，主席提出，要幾千萬人直接同他見面，要一次一次接見下去。」

早在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是在杭州召開的）就說過：全國各地學生要去北京，應該贊成，應該免費，到北京大鬧一場才高興呀！毛澤東要「天下大亂」，先「亂」而後「治」。

中央文革小組做了大量壞事，名聲很臭，其實它也不是一件好事沒有做過。這裏提供了做好事的一個例子，不過好建議被否定掉了。

## 七 關於彭德懷的一些資料

1959年7月4日，劉少奇在廬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說老實話的人，去年不好混。去年對經濟生活造成很大影響，決不可小視。1958年經濟豐富，教訓深刻。1958年最大成績是得到教訓。毫無悲觀、抱怨之必要，不要責備下面。7月6日，朱德在廬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南組會上發言，說：農民還有私有性的一面。供給制，共產風。全黨在生產上、消費上吃了大虧。供給制是共產，農民就如此願意共產？食堂（按：指公共食堂）全垮了也不見得就是壞事。農民要富，要使之富起來，不會成為富農路線。工業主要是大煉鋼鐵搞亂了，其他亂得不太大。各省不要搞工業體系，工業方向要。7月14日，彭德懷致毛澤東信，就若干重大問題提出批評。7月21日，張聞天在東北組會議上作長篇發言，同意彭德懷的意見，並作了系統的說明。7月23日，毛澤東在會上講話，發動批彭。

1959年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1,061名師以上幹部出席會議，另有508人列席。會議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反黨罪行」和所謂「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外事會議上有人提出彭德懷的所謂「裏通外國嫌疑」問題。9月11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和外事會議上，批判彭德懷。他說：有幾位同志，據我看，他們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同路人。他們只是資產階級份子，投機份子，混在我們黨內。

據丁隆炎（彭梅魁和她的伯父彭德懷）（載《時代的報告》1983年第5期），彭德懷1961年說過：「我想過了，只我甘願毀滅還不行，我生不求功，死不圖留名，但還是留下一個不公正的風氣！想打倒一個人，就給他安個莫須有的罪名，這個罪名站不住，就再安一個。這就不是毀滅我一個人的問題，是毀滅了一個黨。」

1959年9月11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和外事會議上，批判彭德懷。他說：有幾位同志，據我看，他們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只是資產階級份子，投機份子，混在我們黨內。彭德懷1961年說過：「想打倒一個人，就給他安個莫須有的罪名，這個罪名站不住，就再安一個。這就不是毀滅我一個人的問題，是毀滅了一個黨。」

1962年1月27日，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說：「僅僅從彭德懷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問題不是彭德懷同志這封信寫錯了。問題不在這裏。」「……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個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同志想篡黨，這就是廬山會議要展開那場鬥爭的根本原因。」

彭德懷沒有能夠參加七千人大會。彭大將軍在得悉上引講話後，大哭一場。1962年6月16日，彭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遞送一封長信（即「八萬言書」），詳述了自己的歷史，請求中共中央全面審查，並特別申明，他在黨內從未組織過甚麼「反黨小集團」，也沒有「裏通外國」的問題。8月23日，他又寫一短信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再次懇求中央組織專案審查，以澄清問題。（「八萬言書」，當時連中央常委陳雲都沒有見到過，八屆十中全會上摘錄印發。）

1962年8月5日，毛澤東同華東、中南兩大區負責人談話時說：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彭德懷平反。他還表示，絕對不能給彭分配工作。八屆十全會決定成立專案審查委員會（主任賀龍），對彭德懷進行審查。這個委員會，比較實事求是，沒有給彭強加以罪名。

1965年秋，彭真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彭德懷，向他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要彭到西南領導大三線建設。彭回家後對警衛參謀景希珍說：「我沒答應，我不懂工業，也不想搞和軍隊有關的事，因為我早和軍隊脫離關係了。」他致毛澤東一信，要求調他到國營農場去，說他還是願當農民。

1965年9月23日，毛澤東與彭德懷談話。談話的主要內容，彭在談話後作了追記。這個追記是《彭德懷自述》一書的附錄二。毛說：「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興得睡不着。」「你到西南區是適當的。將來還可帶一點兵去打仗，以便恢復名譽。」「彭去西南，這是黨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時，要他同我來談。」談到廬山會議時，毛說：「真理可能在你那邊。」（這次談話，景希珍口述的《在彭總身邊：警衛參謀的回憶（1950-1966）》一書第112至114頁上作了記敘。）

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彭德懷我這次找他談話，他想搞軍工。我跟他說了，一扯扯了五個半小時。「王明、李立三、彭德懷這些人選不選？我是傾向於選。」「斯大林的辦法就是把他們殺掉，我們的辦法，中央委員會是左、中、右，有右的好。」言下之意，彭德懷右（大區書記，參加了這次會議。毛的講話，有的大區在當時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分組會上作了傳達）。

毛澤東1965年9月23日與彭談話，先後在場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毛要彭到西南大三線任副總指揮，彭不好拂意違令，同意了，卻遲遲接不到調令，得不到出發的通知。

1965年11月30日，彭到達成都。車站上沒有一個當地負責人來接待。這一天，正巧《人民日報》轉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連幾天，沒有一個當地的有關負責人來看望他。彭接到出席一個晚會的通知，他出席了，當地的許多負責人與坐在彭前面座位上的一些人熱情握手、寒暄歡笑，沒有一人走到彭的前面。

1962年6月16日，彭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遞送一封長信，申明他在黨內從未組織過甚麼「反黨小集團」，也沒有「裏通外國」的問題。1962年8月5日，毛澤東說：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彭德懷平反。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說：「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同陳伯達、艾思奇、關鋒等人談話，說：「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1966年6月16日，關鋒、戚本禹聯名給江青、康生、陳伯達寫信，誣陷說：「彭德懷到三線以後還在積極進行不正當的活動」，「直到現在還是一面黑旗」。他們提出：「要徹底消除這個隱患。」（關鋒1980年1月24日交代：「1966年6月間，在上海開會。江青對我和戚本禹說，分配彭德懷到三線任副總指揮，不是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並不同意。但在中央佔少數，只好同意他去。毛主席說：一個共產黨員，可以保留意見，可以向中央提出意見。我聽了就信以為真了。我和戚本禹共同給毛主席寫了信，表示不同意彭德懷任三線副總指揮。」）

1966年12月，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指使，布置北京地質學院的朱成昭、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派人去四川挾持彭德懷。《快報》（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編印，絕密，印數極少，只供毛澤東、林彪、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等極少數人參閱）第748號（1966年12月21日）報導了韓愛晶布置抓彭德懷的任務的情況。12月26日，戚本禹寫信向江青報告：「彭德懷現在已經被紅衛兵抓住，一二日內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學生，已經作了鬥爭的準備。」12月8日，彭被揪回北京，由紅衛兵帶到地質學院。周恩來聞訊後派傅崇碧去接到北京衛戍區加以監護。

1967年1月1日，彭給毛澤東寫一短信，報告已被押解到京，失去自由。7月，毛澤東指示：公開發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彭德懷的決議。

《快報》第3199號（1967年7月20日）報導：北航、地院六十多人7月19日下午在北航鬥爭、審訊了彭德懷，為召開鬥爭大會作準備。會開了一個多小時，韓愛晶等氣憤之下打了他一頓（按：彭被打倒在地七次，前額被打出血，肺部受了傷，兩根肋骨被打斷。這些情況，北京衛戍區上報了）。《快報》第3396號（1967年7月26日）報導：7月26日下午4時，北航、地院學生鬥爭彭德懷、張聞天（按：彭身負重傷，被揪到「批鬥彭德懷的萬人大會」上。會上又搞「噴氣式」。會後，又把彭押上卡車進行遊鬥，由兩個人揪着他的耳朵，一個人托着頭，扳着腰，拳打腳踢，從北航經新街口、西單一直遊鬥到天安門。彭的手和胳膊全被擰壞，渾身傷痕纍纍，已經不能行走，是被人從汽車上抬下來的。以上部分情況，北京衛戍區上報了）。《快報》第3424號（1967年7月27日）報導：北航「紅旗」公布了彭德懷的認罪書（按：北航小報刊登了「認罪書」全文。彭在「認罪書」中，說了1959年7月14日寫信問題，表示認罪）。

此後，幾個大單位的造反派召開幾千人或萬人大會面對面批鬥彭德懷。所有的面對面的批鬥，都是上面批准的。

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報》摘要發表〈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這一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彭德懷及其後台罪責難逃〉，刊登《紅旗》雜誌第13期社論〈從彭德懷的失敗到中國赫魯曉夫的破產〉、《解放軍報》8月16日社論〈宜將剩勇追窮寇〉。三篇社論，都說到彭的「黑後台」是「中國赫魯曉夫」，即劉少奇。

1970年9月17日，彭德懷專案審查小組遵照黃永勝的「結案材料可以上報」的批示整理好材料報上。這個報告提出：「撤銷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11月3日，經黃永勝同意，這個報

1966年12月，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指使，派人去四川挾持彭德懷。67年7月19、26日，先後鬥爭彭德懷、張聞天，並揪到「批鬥彭德懷的萬人大會」上。會後，又把彭押上卡車進行遊鬥。彭的手和胳膊全被擰壞，渾身傷痕纍纍。74年11月29日，彭被迫害含冤逝世。臨終前，他囑咐侄女梅魁：「把我埋到老家去，上頭種一棵蘋果樹，讓我最後報答家鄉的土地和鄉親……」

告報給彭德懷專案組組長周恩來。周恩來作了大意如下的批示：呈主席閱批。毛澤東作了大意如下的批示：政治局各同志閱。政治局「各同志」都圈閱了。報告存檔。

1974年11月29日，彭被迫害含冤逝世。終年七十六歲。臨終前，他囑咐侄女梅魁：「把我埋到老家去，上頭種一棵蘋果樹，讓我最後報答家鄉的土地和鄉親……」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為彭德懷平反的決定。12月24日，首都隆重舉行彭德懷追悼會。

彭大將軍是我一生最為崇敬的人。

## 八 一個大人物的沉浮

烏蘭夫是蒙古族老革命。1966年他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等要職。66年7月23日，華北局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報送了一份報告，給烏蘭夫戴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大帽子。報告指烏蘭夫和主席公開唱對台戲。反覆強調民族問題是內蒙古自治區最大的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民族問題，烏蘭夫又說學毛選要從自治區的實際出發，要有的放矢。

這個大人物就是烏蘭夫。他又名雲澤，蒙古族，是位老革命，1923年12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入黨後任過許多領導職務。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將軍銜。1966年他任如下要職：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二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內蒙古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內蒙古大學校長。

人們都知道在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錯誤地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可能不少人還不知道同月還錯誤地批判了烏蘭夫。對烏蘭夫的批判，是在5月華北局召開的工作會議上進行的。從6月7日到7月20日，又揭發、批判了四十三天。7月23日，華北局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報送了《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給烏蘭夫戴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大帽子。

不能說烏蘭夫在工作中沒有一丁點兒錯誤，但是總的來說批判以是為非。謂予不信，請看《報告》最重要的第一部分的摘抄：「烏蘭夫放肆地篡改和歪曲毛澤東思想。1963年8月8日，毛主席在《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正義鬥爭的聲明》裏說：『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的問題。』烏蘭夫……一再說：『民族問題就是人民問題』，『毛澤東思想是民族團結』，『毛主席關於民族問題的基本概念：鞏固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只要在民族問題上抓住這兩條，我看就根本抓住了民族問題的核心。』」「主席說：『蒙、漢兩族要密切合作，要相信馬克思主義。……不要一定是本省人執政，不管哪裏人——南方或北方，這族或那族，只問那個有沒有共產主義？……』……而烏蘭夫不僅沒有在黨內傳達這一指示，反而和主席公開唱對台戲。他強調『逐步實現黨的領導機關民族化，是一個帶根本性的任務。』」「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澤東思想，突出階級鬥爭。而烏蘭夫卻……反覆強調『民族問題是內蒙古自治區最大的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民族問題，突出民族問題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烏蘭夫卻……說：『學毛選要從自治區的實際出發，要有的放矢。……不從實際出發，不解決針對性問題還不是教條。』『學習毛澤東思想要與內蒙古實際相結合。』」不必贅引了。誰是誰非是很清楚的。

彼時是非混淆。烏蘭夫的華北局第二書記、內蒙古軍區司令員和政治委員、內蒙古大學校長等職務先後被撤掉了。一時還保留了一些職務，但在實際上，烏蘭夫在5月以後就「靠邊站」了。

在內蒙，很快出現了打倒烏蘭夫的一派(少數派)和擁護烏蘭夫的一派(多數派)。1967年1月，在呼和浩特市出現了「紅衛兵捍衛毛澤東思想地下司令部」為烏蘭夫翻案的傳單。內蒙古軍區的廣大指戰員，站在多數派一邊。

1967年1月20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致電中共中央並華北局，請求批發《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顯然，想以中央的威望來壓制多數派。1月23日，華北局給毛澤東、中共中央打報告，表示同意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的請求。報告建議：「把烏蘭夫的錯誤問題，在內蒙古自治區地方和軍隊黨的基層組織中，在革命群眾的組織中，進行公布，以利於內蒙古自治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1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

壓而不服。首先內蒙古軍區不服，公然抗命。全國第一個開槍打死學生事件，發生在內蒙古軍區。在1967年2月4日，內蒙古軍區一軍官開槍打死衝擊軍區的、持打倒烏蘭夫觀點的學生韓桐。

打倒烏蘭夫的一派和反對打倒烏蘭夫的一派，在1967年、1968年進行了劇烈的爭鬥。

文革中，全國涉及人數最多的冤案是「內蒙古人民黨」冤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特檢字第一號)》說：「內蒙古自治區『內人黨』等冤案，有346,000多名幹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確有壞人興風作浪，但是說到底，這是由打倒烏蘭夫引起的。1967年，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一負責人在革籌小組會上說：「烏蘭夫披着民族外衣，在內蒙古幹了二十多年的反革命勾當，他的這條修正主義、民族分裂主義路線真是又粗、又黑、又深、又長。」挖「黑線」、肅「流毒」的結果，是製造了「內人黨」冤案。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代表中共中央，宣布解放烏蘭夫。8月，烏蘭夫被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烏蘭夫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1988年12月8日病逝於北京。

1967年，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一負責人說：「烏蘭夫披着民族外衣，在內蒙古幹了二十多年的反革命勾當，他的這條修正主義、民族分裂主義路線真是又粗、又黑、又深、又長。」挖「黑線」、肅「流毒」的結果，是製造了「內人黨」冤案。文革中，全國涉及人數最多的冤案是「內蒙古人民黨」冤案，有346,000多名幹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

## 九 一張死亡名單

1980年11月10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辦公室向有關部門報送《受林彪、「四人幫」及其幫派骨幹殘酷迫害致死的著名作家、藝術家名單》。許多作家、藝術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這是人們所知道的。這張名單沒有公布過，所以許多人不知道這張名單。它是中國文聯所寫，自然有其權威性。現將《名單》一字不易地抄錄如下：

在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誣陷、凌辱下，許多優秀的作家、藝術家被迫害致死。許多同志和林彪、「四人幫」進行過英勇不屈的鬥爭，含



冤而死，甚至慘遭迫害；有的因生前受到殘酷迫害，心身遭到嚴重摧殘，先後逝世。其中有：

著名作家、詩人：老舍、田漢、阿英、趙樹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鄭伯奇、楊朔、郭小川、聞捷、蔣牧良、李廣田、劉樹德、孟超、陳翔鶴、納·賽間朝克圖、馬健翎、魏金枝、司馬文森、羅廣斌、海默、韓北屏、遠千里、方之、蕭也牧；著名文藝評論家馮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劉芝明、何家槐、葉以群、侯金鏡、陳笑雨、徐懋庸；著名翻譯家董秋斯、傅雷、滿濤、麗尼；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周信芳、蓋叫天、荀慧生、馬連良、尚小雲、言慧珠、李少春、葉盛蘭、葉盛章；著名話劇藝術家章泯、焦菊隱、孫維世、舒繡文；著名電影藝術家蔡楚生、鄭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上官雲珠、應雲衛、孟君謀、徐韜、顧而已、魏鶴齡、楊小仲、劉國權、羅靜予；著名地方戲曲藝術家張德成、李再雯、嚴鳳英、蘇育民、顧月珍、筱愛琴；著名音樂家鄭律成、馬可、黎國荃、顧聖嬰、向隅、蔡紹序、陸洪恩；著名美術家潘天壽、王式廓、董希文、豐子愷、陳半丁、秦仲文、陳煙橋、馬達、倪貽德、蕭傳玖；著名民族歌手、民間詩人毛一罕、琶杰、王老九、霍滿生；著名攝影家張印泉、鄭景康；著名曲藝家王尊三、王少堂；著名木偶藝術家楊勝等同志。這些同志的逝世，是我國革命文藝事業的重大損失，是林彪、「四人幫」的血債，是他們禍國殃民的罪證。

中國文聯辦公室

1980年11月10日

1980年11月10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辦公室向有關部門報送《受林彪、「四人幫」及其幫派骨幹殘酷迫害致死的著名作家、藝術家名單》。這張名單的標題拉上「林彪」，是當時欽定的用法，但其實一大批文藝家受迫害，與林彪並沒有關係。標題中提到「四人幫」，也不確切。若干文藝家死於1973年8月以前，而那時「四人幫」根本不存在。

這裏說的「致死」，顯然不限於1976年10月6日以前。如郭小川是1976年10月18日逝世的，鄭律成是1976年12月7日逝世的。

這張名單並不完全，遺漏不少。既然不限於1976年10月6日以前，既然包括「因生前受到殘酷迫害，心身遭到嚴重摧殘」而逝世的，那就要加上許多名字，如李六如、趙丹、周揚、瞿白音、馮喆。

這張名單的標題很不確切。名單中拉上「林彪」，是當時欽定的用法，其實不符合歷史事實，一大批文藝家受迫害，與林彪並沒有關係。若干文藝家之死與《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下發是有關的，但是《紀要》是經過毛澤東三次修改並定稿，又是中共中央批發的，自然不能歸咎於林彪。林彪一般不管文藝界的事，不管小事，不管某個人的事。標題中提到「四人幫」，也不確切。1973年8月才有「四人幫」，在這以前根本不存在「四人幫」，而若干文藝家死於1973年8月以前。江青、張春橋在文藝界做過很多壞事，負有罪責；但是若干文藝家之死原因複雜，與江、張也無關涉，不能一概歸咎於江、張。著名翻譯家傅雷，家中被紅衛兵搜出了親戚寄放的「反動物品」，他與夫人朱梅馥忍受不了凌辱，雙雙自縊而死，這就與江、張沒有直接關係。二十九歲的優秀鋼琴家顧聖嬰同母親秦慎義、弟弟顧握奇不堪虐待而一齊自殺，主要原因是受了父親顧高地冤案的株連。

每一個文藝家之死都有一個悲慘的甚至慘絕人寰的故事。他們的死，是對江青、張春橋之流的控訴，也是對「左」傾錯誤的譴責。

## 十 三個搞不通

關於文革，我有許多搞不通，本篇中且只說三個。

一是許多壞事為甚麼都歸咎於林彪、「四人幫」？林彪確實犯過錯誤，「四人幫」確實不是好東西，但是以明明不是他們幹的壞事，加罪於他們，這是忠實於歷史嗎？例子不勝枚舉。在「四人幫」被粉碎後，開過許多平反會、具有平反實質內容的追悼會，《人民日報》作過報導，十之五六說被平反者生前遭到林彪、「四人幫」迫害。我所尊敬的金山也未能免俗，他在〈莫將血恨付秋風〉（《人民日報》，1978年10月15日）中說：「孫維世同志被『四人幫』害死在冤獄。」孫維世明明被江青害死，為甚麼要說「四人幫」呢？孫維世1968年10月14日慘死獄中，那時「四人幫」還沒有形成。文章又說：「殺害孫維世同志的元凶，是禍國殃民的林彪、『四人幫』。」這更離奇了，林彪過去在蘇聯和東北戀過孫維世，在文革中與孫維世之死毫無關涉，怎麼又扯上林彪呢？《人民日報》1978年7月6日報導：「時傳祥慘遭『四人幫』迫害致死。」時傳祥之死與江青公開點名批判他直接有關，與他在1966年公開保護劉少奇有關，說「四人幫」是與事實不合的。國家出版局在〈肅清林彪、「四人幫」在出版工作中的流毒〉（《人民日報》，1978年7月7日）中譴責林彪、「四人幫」對出版工作的破壞，其實林彪從未過問出版工作。新華社1979年8月2日訊：「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決定為林彪、『四人幫』和那個顧問製造的所謂『三家村反黨集團』冤案徹底平反。」最初提出要批判「三家村」的是誰呢？最初說鄧拓是「叛徒」的是誰呢？是我們所敬愛的毛澤東。時間：1966年3月。

我無意為任何人鳴冤叫屈。我只是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忠實於事實。如果對事實都不尊重，還談得到實事求是嗎？

第二個搞不通是把提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作為陳伯達的「罪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特法字第一號）》說：「陳伯達……1966年提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口號，煽動對廣大幹部和群眾的迫害鎮壓。」這是作為「罪行」說的。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致江青信中提出過「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原話是：「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毛澤東此信後來在全黨公布。毛澤東可以說，為甚麼陳伯達說了就是「罪行」呢？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的標題。誠然，這篇社論是根據陳伯達的意圖寫成，又經陳伯達審定和簽發的，標題也是陳伯達擬定的；但是它無非是「把《五一六通知》的內容捅向全國」<sup>①</sup>，而且通篇只講意識形態領域，說不上「煽動對廣大幹部和群眾的迫害鎮壓」。社論是公開發表的，彼時並無任何人反對，周恩來還在公眾場合兩次以肯定的語氣提到這篇社論。陳伯達在別處沒有提出過「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個極壞的口號，但是我們要劃清「罪」和「非罪」的界限。

三是我搞不通對蒯大富判刑為甚麼要那麼重——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

文革中的許多壞事都歸咎於林彪、「四人幫」，以不是他們幹的壞事，加罪於他們。例如孫明明是被江青害死，她1968年10月14日慘死獄中。但後來金山撰文說：「殺害孫維世同志的元凶，是禍國殃民的林彪、『四人幫』。」孫去世時，「四人幫」還沒有形成；而林彪過去在蘇聯和東北戀過孫維世，在文革中與孫之死毫無關涉。

陳雲說過<sup>⑫</sup>：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內亂。但這是一場政治鬥爭。這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政治鬥爭。這場鬥爭被若干個陰謀野心家所利用了。在這場鬥爭中，有許多幹部、黨員、非黨人士受到了傷害。但「文化大革命」從全局來說，終究是一場政治鬥爭。因此，除了對於若干陰謀野心家必須另行處理以外，對於其他有牽連的人，必須以政治鬥爭的辦法來處理。

中共中央同意這個意見，對於在「文革」中犯錯誤的老幹部，一律從寬處理。從寬處理是正確的。

在那個「發瘋」的年代（陳伯達在特別法庭上說的），在那個無法無天的年代，一切怎麼能夠以常情而論呢？許許多多老幹部在文革中都不辯是非，犯了錯誤，對他們從輕發落，為甚麼苛求於一個毫無政治鬥爭經驗的大學生呢？

我搞不通不等於別人也搞不通，願明達者有以教我。

我搞不通蒯大富的判刑為甚麼那麼重——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陳雲說過：文革終究是一場政治鬥爭。因此，除了對於若干陰謀野心家必須另行處理外，對於其他有牽連的人，必須以政治鬥爭的辦法來處理。在那個發瘋的年代，許多老幹部在文革中都不辯是非，犯了錯誤，對他們從輕發落，為甚麼苛求於一個毫無政治鬥爭經驗的大學生呢？

### 註釋

- ① 毛澤東：〈大量吸收知識份子〉（1939年12月1日），載《毛澤東選集》（橫排袖珍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頁581。
- ② 周恩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1956年1月14日），載《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162。
- ③ 毛澤東：〈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1956年8月30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302。
- ④ 載《紅旗》，1981年第23期，收入《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⑤ 張聞天：《張聞天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517。
- ⑥ 轉引自《偉大的歷史文件》，《人民日報》，1967年5月18日。
- ⑦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對敵鬥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1968年12月26日）中寫道：「在犯過走資派錯誤的人們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數，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錯誤的是多數，不要一提起『走資派』，就認為都是壞人。」
- ⑧ 在黨的八屆十一全會以前，中央接受毛澤東的提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第一線、第二線，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為第一線，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為第二線。事實上，毛澤東始終未真正居於第二線。
- ⑨ 〈伍修權同志回憶錄之四——中聯部八年（1958.10-1966.12）〉，載《中共黨史資料》，第七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3）。
- ⑩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載《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273。
- ⑪ 《人民日報》編輯：《學習〈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1），頁115。
- ⑫ 陳雲：〈關於「兩案」審理工作的意見〉（1981年11月19日），載《陳雲文選（1956-1985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274。

王年一 1932年生，《大動亂的年代》的作者，寫作此書時任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正師職教員。1988年離休，仍繼續研究文化大革命，發表了大量有關論文。